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王海飞 著

# 文化传播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

——裕固族30年来文化变迁的民族志阐释



WENHUACHUANBO YU RENKOUJIAOSHAMINZU WENHUA BIANQIAN  
——YUGUZU 30NIANLAI WENHUA BIANQIAN DE MINZUZHICHANSHI



民族出版社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WENHUACHUANBO YU RENKOUJIAOSHIAOMINZU WENHUABIANQIAN  
—YUGUZU 30NIANLAI WENHUABIANQIAN DE MINZUZHICHANSHI

王海飞 著

# 文化传播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

裕固族30年来文化变迁的民族志阐释



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传播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裕固族30年来文化变迁的民族志阐释/王海飞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2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ISBN 978-7-105-11204-3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裕固族—民族文化—研究—甘肃省  
IV. ①K2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7307号

策划编辑:杨青

责任编辑:杨青

封面设计:刘家峰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mzcbs.com>

印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300千字

印张:17.25

定价:45.80元

ISBN 978-7-105-11204-3/K·1967(汉109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相关说明 .....	(13)
第一节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13)
第二节 相关说明 .....	(29)
第二章 裕固族及其传统文化概况 .....	(32)
第一节 裕固族概况 .....	(32)
第二节 裕固族传统文化概述 .....	(42)
第三章 裕固族社会文化传播模式及其特点 .....	(60)
第一节 大众传播模式 .....	(61)
第二节 学校教育传播模式 .....	(91)
第三节 社会文化传播模式 .....	(98)
第四节 当前裕固族地区文化传播的特点 .....	(107)
第四章 文化传播语境中裕固族文化的变迁及其特点 .....	(123)
第一节 裕固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	(123)
第二节 定居、半定居：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的加速器 .....	(127)
第三节 居住环境变迁引发的其他文化变迁 .....	(138)
第四节 民族语言文化的变迁 .....	(148)
第五节 宗教文化的变化 .....	(160)
第六节 现代婚姻和生育文化的变迁 .....	(168)
第七节 裕固族民族文化变迁分析 .....	(175)

## · 文化传播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

第五章	显性变迁之下的隐性内涵 .....	(184)
第一节	“精英”阶层、价值取向及家庭结构的变化 .....	(185)
第二节	渐行渐远的民族记忆 .....	(197)
第三节	民族心理结构的变化 .....	(201)
第六章	面对文化传播的民族文化回应 .....	(208)
第一节	民族文化回应表现 .....	(208)
第二节	保护与发展的二元悖论 .....	(222)
第七章	由裕固族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播生态的重构 .....	(227)
第一节	文化传播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 .....	(227)
第二节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播生态重构 .....	(240)
余 论	.....	(252)
主要参考文献	.....	(255)
附录一：部分调查访谈对象姓名缩写对照表	.....	(259)
附录二：裕固族文化变迁影视人类学片《祁连山下》(解说词)	.....	(260)
后 记	.....	(268)

# 绪 论

## 一

对文化的研究一直是民族学、人类学重点关注的领域。研究人类文化的论述，从古到今、从中到西，灿若星河，多不胜数，即便在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范畴中，从早期一脉相承于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古典进化论学派<sup>①</sup>到更加注重文化功能的功能结构学派<sup>②</sup>，再到当代的符号象征理论<sup>③</sup>，也已走过了百年以上的辉煌历程。无论何种学派，面对人类文化研究有一点是一致的——认为“文化”既存在静态的深层结构，又存在动态的发展变化，对其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文化”这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本身具有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正是这种变化，构成了我们生活其中的人文世界，也构成文化变迁研究的宽阔场域。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按结构可分为四个层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无论哪一种文化，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都在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多或少、或表象或本质的变迁。文化变迁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在文化系统内部发生，另一种是在文化系统外部发生，即在一个文化系统与另一个文化系统的接触和碰撞中以及文化系统的外部环境

---

①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人类学派，代表人物为英国学者泰勒（1832—1917年）和美国学者摩尔根（1818—1881年）。

② 20世纪主要文化人类学派，代表人物有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年）和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年）。

③ 产生于20世纪初，作为研究象征的学派则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由英国和美国的学者创立。许多著名学者都曾从事过象征的研究，如英国学者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特纳、尼达姆、科恩和美国学者格尔茨等。

的变化中发生。变迁所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和价值观的冲突与改变，是任何一个人，包括民族主义论者和“现代化”论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些学者秉持着“文化—现代性—西方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的单向理论，等待着强势经济作用下的现代性由世界体系转化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内容，而另一些学者，在同样的语境下成为“现代焦虑症”和“失语症”的双重患者。相同的二律悖反成为每个真诚的文化研究者的头顶之剑，心中之痛。

文化变迁因条件与结果的相互作用与包含而呈现出的复杂过程，决定了研究的难度，也决定了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每一项对文化变迁过程的关注中，几乎都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理论的方方面面，如族别问题研究、族群关系研究、民族心理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以及专题研究等，而且这些研究不仅需要本学科各分支的通力合作，同时还需要其他兄弟学科的理论介入，如社会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传播学，甚至一些自然学科等。研究要求在各相关学科理论指引下，用较长的时间，长期深入到田野中，深入到“文化持有者”的群体中，参与观察、深入访谈，获得文化各个层面的第一手资料，再经过书斋中的分析、整理，或需要回到田野中再调查，如此往复。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案头作业，诸如比较和跨文化比较、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历时态和共时态分析、社区内外关系分析、谱系分析、生活习俗描述和考古文物以及文化残存分析等等，都将会是研究的重要环节。“我们在考察某些受到现代化或其他文化变迁冲击的传统文化时必须细致入微观察这些文化所遇到的一些问题。”<sup>①</sup>做到了这一切，我们会依然很惶恐，我们依然不能认定，我们是否成功地完成了一项文化变迁研究，是否使这一研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复兴具有意义和价值。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

<sup>①</sup> [美] 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5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化的必由之路。<sup>①</sup> 这四项任务，涉及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涉及全体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水准，涉及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涉及到中华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当然，也涉及到每一个文化研究者每天的工作与思考。

## 二

裕固族，对我而言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因工作原因曾多次进入到裕固族地区采访与拍摄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由此结交了许多裕固族朋友，他们的热情与豪爽使我觉得我与他们之间亲若兄弟，无丝毫距离；陌生是因为每当我坐在城市中的一个角落里重重叠叠地翻阅我所获得的有关这个民族的所有书籍和调查材料时，闭上眼，想到遥远草原上的醇香美酒、醉人歌舞，想到我的那些朋友，我便疑惑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历经战火与劫难；在荒远的丝路古道上，向着太阳，悲壮前行的东迁之路；操着两种不同的语言，他们勤苦地劳作，安家于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从此繁衍生息，代代不绝；一万多人的群体，在民族间的同化与交融从未停止过的历史舞台上，似祁连山上的劲松，苍翠繁茂，历久弥新。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是我面对这个民族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2006年农历正月初一，我踏上西去的列车，目的地是甘肃张掖。下火车后经过短暂的休息和准备，再次坐上汽车，前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双海子村。因为时值中国传统春节，我的到来受到了双海子村民格外的热情款待，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手持摄像机，怀揣笔记本，学着当地的礼俗，每天提着由砖茶、冰糖组成的简单礼品，不停地东家进、西家出，甚至自己驾驶借来的摩托车到20公里外的人家去拜年、拍摄、做访谈，去10公里外的人家参加婚宴。在每一个陌生的家庭中，我都享受到“贵宾”的礼遇，所有的人对我都非常友善。就这样，我度过了2006年整个春节。这一次的调查，没有解开我之前的疑惑，反而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在我脑海中。双海子村是一个新的生态移民村，村民都是2000年前后搬迁到这里的（这一特点倒使我在后来的研究中感受到“典型”范本的

<sup>①</sup> 参照《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31~34、60~81页，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



研究意义),各家都有政府分配的大约20亩土地,用来进行农业种植,基本没有牧业生产。这与我早先接触过的,已在我头脑中形成概念的裕固族完全不一样,不是蓝天白云、草场辽阔、牛羊遍地的游牧景象。这里的裕固族人住在整齐划一的砖瓦房里,房中的装修、陈设包括家用电器的摆放方式,都与我在中国北方其他地区汉族农村见到的农户家庭没有任何区别;门前是宽阔的马路,房前屋后是平整的方田,院子里晾晒着金黄的玉米;人们脸上带着富足的笑容,穿着仿造的世界或国内的名牌服装,看的是通过自家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到的最时尚的都市资讯;餐桌上,一面摆着裕固族待客传统必备的用大盆装的手抓羊肉,旁边是易拉罐饮料“可口可乐”。这一切场景,像是荒诞的现代绘画作品,使我愈加迷惑。可以肯定,裕固族在发生变化,在原有传统文化中,加入了很多新的、外来的文化因素。是些什么因素,或者说什么文化,又通过什么渠道,进入到裕固族的文化中,对民族原有的文化发生怎样的作用?这是我进入裕固族社区后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在此后多次、累积时间达一百多天的田野调查中,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寻求便成为我的主要工作目标,贯穿始终。

调查之后的写作,于我而言是一段更为艰苦的跋涉。此前多次调查得来的几十万字的文字资料、1000多分钟的影像素材,上百张照片,加上从其他渠道找来的裕固族研究材料,堆满了我的房间和思维空间,使我几近被淹没。一般研究者包括著名的人类学家都是从一个明确的理论出发,提出论点,展开论述,这是比较规范的方法。而我除了大量的材料,只有一个模糊的方向,除了一遍遍地对素材的梳理与审视,别无他路。这是一个痛苦而又使我受益匪浅的过程。伴随着无数个晨昏交替的时间流淌,在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第三个问题慢慢地产生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裕固族文化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剧烈变迁,这与大量外来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密不可分,这些作用和影响对裕固族这样一个人口只有一万多人的民族意味着什么?是“现代化”的发展机遇,还是传统文化的消亡征兆?变迁的表现摆在眼前,改变的深层内涵又是什么?推而广之,裕固族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人口较少民族同样面临的,这其中的答案与规律又是否适用于所有人口较少民族?第三个问题实质是同方向的一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伴随着整个写作的过程。

至此来看,随着我对裕固族文化变迁研究的逐步深入,三个呈递进关系的问题成为牵着我前行的思维线索,同时也构成本书的大体框架。第一部分为一、二章,相对应第一个问题,即裕固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第二部分为三、四、五章,对应第二个问题,什么文化?通过什么渠道?对

裕固族原有文化发生什么作用？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包括第六、七章，意欲阐释外来文化的传播对以裕固族为代表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有着怎样的意义？民族文化又当如何回应？无论是否交出了使人满意的答案，这项研究的进程确实是以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为序进行的。可能因学术积累的浅薄而纰漏层出，但的确是长时间苦思冥想的结果，个中甘苦，惟寸心知，敬请广大学者审阅。

### 三

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自己的中国弟子——（同样也是著名学者的）费孝通先生所著人类学专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作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未来的人类学）对现代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提出了重要的基本要求：研究文化变迁、文化接触现象、现代文化的传播。”<sup>①</sup>这句话明确指出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并指出文化接触与传播在文化变迁研究中的价值。文化传播和文化变迁及两者关系的研究，自19世纪始就一直一直是西方人类学界积极致力方向。近两个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不断加深着学界对这两个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传播的力量，林顿<sup>②</sup>甚至认为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90%的成分是由传播而来。他曾经用一段精彩的文字，详细描绘了一位普通美国人自早晨床上醒来直至一整天的生活，所使用的所有物品，吃的所有食物，乃至他的所有习惯与宗教信仰，无一不是文化传播的作用与结果。<sup>③</sup>

类似林顿的具体且繁琐的叙述也许使文化传播的概念过于“泛化”、过于关注表象而失去学术意义，但是对于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的细致分析，却是我在裕固族文化变迁研究中面对纷杂的群体文化现象愿意去尝试的角度和方法。

在人类学界中，首先提出文化传播问题的是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他倡导的“传播主义”成为“传播学派”理论之源。<sup>④</sup>随后英国的里弗斯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② 林顿（1893—1953年），美国人类学者，主张从个体考察文化，并把个体与文化连接在一起研究。

③ 参照童恩正：《人类与文化》，291～29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④ 拉策尔（1844—1904年），德国学者，传播论学派的奠基人，其提出的“传播主义”与早期进化论学派针锋相对。

提出令学人诟病的极端的“泛埃及论”<sup>①</sup>，再到后来德奥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文化圈”<sup>②</sup>、“文化区”<sup>③</sup>理论，这是人类学派早期与人类文化传播问题的几次相遇。在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又指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sup>④</sup>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也突出强调文化整合离不开传播的作用。她说：“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理解时，有一个社会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传播的意义……服饰、技艺、仪式、讲话、婚姻上的经济交易等特质，在所有的大陆上都得到了广泛传播。”<sup>⑤</sup>创立“文化科学”的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时，亦看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巨大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sup>⑥</sup>更不用说重要的传播学者施拉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类传播的意义和作用所做的进一步阐述：“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它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不断地延伸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信息渠道。”<sup>⑦</sup>

以上是对西方文化传播学派发生、发展进程作一个简单的巡礼，可以看出来这一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学科本身的发展脉络就是从偏激、主观到理性、客观的过程。因为我长期从事的传媒工作的背景和对这一学派理论的研究使我最终确立了对裕固族文化变迁研究的观察视域和进入角度。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视域和角度的选择，并非刻意扯起一面理论的大旗为我的研究装点门面，而且我也无意于一脚踏入早已被国内部分学者批判过多次的“唯传播论”阵营做远离本土实践的西方理论的延续或鼓吹，其实在写作中我仍然借鉴、参阅了很多其他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理论。我认为，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整体发生“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文化传播与地域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研究已经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今天的裕固族面临的社会场景和文化传播态势，更适合借用文化传

① 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理论，以英国学者里弗斯代表的极端传播论派，认为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源于古埃及，所以这一派的理论有时被称为“泛埃及论”。

② 德国人类学者格雷布纳提出，指一群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社会集团。

③ 美国人类学者威斯勒提出，指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人们分布的区域。

④ [美]哈里斯著，李培荣等译：《文化人类学》，1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⑤ [美]本尼迪克著，何锡章等译：《文化模式》，18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⑥ [英]怀特著，沈原等译：《文化的科学》，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⑦ [美]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2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播学派的有关理论和研究视角，在微观层面完成对其文化现象由表及里的剖析与解释。

以文化传播视角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所作的研究在国内外都不是很多，并且多数是更微观的电视媒介传播研究。新近的研究成果国外有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所著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sup>①</sup>，研究者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语境及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运用西方成熟的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观察、分析电视媒介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国内有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sup>②</sup>一书，作者通过对独龙族看电视这一现象的细微观察与描述，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社区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另外还有李春霞所著《电视与彝民生活》<sup>③</sup>等，亦属此类研究。

## 四

民族志是20世纪初期由西方人类学家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研究者必须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提供其内部相关活动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进入并生活在被调查对象之中来进行研究，在这一点上，马林（凌）诺夫斯基成为学界的先行者之一，由他所创立的“参与观察法”成为这一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的导论中对这种方法做了三条原则性归纳：“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阐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sup>④</sup>

① [美] 柯克·约翰逊著，展明辉、张金玺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② 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③ 李春霞：《电视与彝民生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④ [英] 马凌诺夫斯基著，梁永佳、李昭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民族志传播学。其标志为美国学者德尔·海默思196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的一期刊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名称。他首先对民族志传播学的任务和内容做了非常明确的概括:“简言之,民族志传播包含了两大特征……首先……它让我们注意到需要新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直接考察语言在情境背景中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单独的对语法、对人格、对宗教、对亲属关系及其他类似物的研究中是无法被揭示的……其次……它必须把一个社区作为语境,把传播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这样任何特定的传播渠道及符码的使用都是作为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sup>①</sup> 海默思的概括中存在两个要点:一是利用第一手材料研究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二是应在一个社区的背景上进行研究。这两个要点贯穿于民族志传播学的调查研究过程:选择研究分析对象——提出民族志问题——通过参与性观察、访谈等途径搜集民族志资料——进行民族志分析——书写民族志。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典的民族志文化研究手段受到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文化认知论的挑战,如语言人类学家派克提出了主位/客位的描写理论。<sup>②</sup> 此时,一种崭新的并对后来的人类学研究产生很大作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产生,并“越过符号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成为当代人类学在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上影响力最为卓著的一个流派”<sup>③</sup>。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阐释人类学,其理论的核心是用新的符号手段即“深度描写”和认知角度即“地方性知识”来认识文化。在他看来,人是由其自身编织的意义之网所支撑的动物,而文化就是这种意义之网。文化分析并非寻求规律性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人类学学者并不能像古典时代所期待的那样完全钻进当地人的脑中,他们与当地入一样在解释着世界,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对当地入的解释的再解释,是从本地入的观点出发来解释本地入——即被研究者的文化。吉尔兹理论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他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和应用。“地方

<sup>①</sup> [美] Hymes:《Introduction: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s》,1964,6,part 2。转引自蔡骥、常燕荣:《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

<sup>②</sup> 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派克提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不同视角的人类学描写方式,由此理论出发创立了主位/客位的描写理论。

<sup>③</sup> [美] 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导读一,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性知识的寻求是和后现代意识共生的。……现代意识的题旨在于统一，在于全球化。统一固然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但从另一角度也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更给世界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之，矫正现代化及全球化的弊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地方性’——求异，不管它的结果是异中趋同，还是异中见异、异中求异。”<sup>①</sup> 在我对裕固族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文明的进步/文明的多样性”或者说“求同/求异”也可以说“发展/保护”这一二元悖论结构一直是思考的矛盾焦点，在这一焦点上反复构建着多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最终指向的确立还是得益于吉尔兹“对当地人的解释的再解释”的理论指导。吉尔兹将“地方性知识”理论体系有效地应用到了人类学的实践中是通过自己的“深度描写”实现的，“深度描写”不是目的，目的是阐释。人类社会生活中随时随地都会遇到需要理解和说明的问题，所以阐释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普遍的客观存在。<sup>②</sup> 阐释带有客观性，“作者的意图就是作品的本义，它对读者来说是客观的”<sup>③</sup>。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捕获到的文化现象纷繁复杂，往往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裕固族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条分缕析，是我希望借助阐释能够达到的目的，也是我最后将这项研究的落脚点定位于“阐释”的原因所在。

## 五

另外需要交代的一个背景是我在研究中对“村落”和“社区”概念的引入。“解剖麻雀”式的“村落”研究是中国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种传统，从费孝通的“江村”<sup>④</sup>到林耀华的“义序”和“黄村”，<sup>⑤</sup>再到王铭铭的“溪村”，<sup>⑥</sup>均是此种研究模式的典范。另外在乡村社会研究中常

① [美] 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导读一，1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② 李建东：《阐释学简论》，载《河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5）。

③ 陈本益：《论赫施的现代形式的传统阐释学观点》，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1）。

④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⑤ 参见林耀华著，庄孔韶，林宗成译：《金翼》，北京，三联书店，1989；《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

⑥ 参见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庭的个案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常采用的还有源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社区”分析性概念，社区是进行一定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民族社区是居住在某一特定区域，成员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或是以某个少数民族为主体，几个民族杂居的，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感而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群构成的区域。<sup>①</sup>这两个概念在本研究中没有作严格的范畴界定，我做田野选择的三个调查点中有一个牧业村、一个农业村，说是村，其实在多次行政区划变动和搬迁定居过程中，以前的若干个村合并为现在的一个行政村，在村的范畴界别上时常会有重合现象，行文中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准。“社区”概念在文中使用时一般是为了区别牧业点、农业点和县城三个在生产、生活环境方面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范围，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述考察范围。

与文本配合，我在对裕固族文化变迁的研究中使用了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希望借此手段可以更直观地表现那些在民族文化变迁中显现出来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力图使研究的结果多一些科学的向度和资料的价值。但摄像机终究不能取代人眼。首先，它不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处于“待机”状态，而美妙、有意味的场景往往是稍纵即逝；其次，它不具备对现象的筛选与过滤功能；最后，摄像机在某些时候就像一名“入侵者”，不见得每个被访谈对象都喜欢对着它表现真实自我。因此下文对我选择的三个调查点的状况分别作一个简述，以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以及为什么要选择其为调查点，尽管其中有一些内容并不全面。

### A 调查点——牧业点——贺家墩村（包括黄土坡村、湖边子村等）

这一调查点是我所考察的裕固族人世代繁衍生息，进行牧业生产的故地。地处河西走廊中部腹地，在茫茫戈壁、荒漠的包围下的绿洲之中，包括几个自然村，距离甘肃省酒泉市很近。这里属于黑河流域水源涵养区域，因每年自然气候的变化，草场的情况时好时坏，所以从十年前开始，由政府组织，陆续将居住在这里的牧民迁出。但是还有一部分牧民或因心理方面的原因，舍弃不下世代生息的环境；或因家中人少，不能适应迁入地劳动强度更高的农业生产，所以仍留在原地，从事传统牧业。但不再是古老的游牧方式，而是在围栏后的自家草场中放牧。留下来的牧户依然可以享受政府的定居帮扶政策，就地定居。围栏后因为草场有限，各家各户的牧业生产规模都降低了，所以牧业方面的收入也相应减少。有一些有经

<sup>①</sup> 郑杭生主编：《民族社会学概论》，60~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营能力的牧民，在从事牧业生产的同时，还在新修建的居民点上开办起旅游经营服务项目，接待附近城市中来这里郊游的游客，有了其他一些收入来源。在这一调查点上今天可以最大限度地观察到裕固族传统文化的表现与遗存。

### B 调查点——农业点——双海子村（包括从牧业点搬来的四个村）

农业调查点是搬迁定居后的裕固族人新的生活生产区域，从生计方式到文化表现，均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人们全部从事农业生产，几乎没有牧业。牧民们搬迁到这里后统一修建住房，可以享受4万元左右的政府补贴，每户房子修建完毕需要8万~10万元。建完房子后的牧民首要任务是向周围的汉族农民及农业技术人员学习农业种植技术。从2000年搬迁到这里，他们这些人一夜之间就由牧民变成了农民，因为不会种地，户收入只有几千元。到2008年户平均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这一批裕固族人完成了世代不变的生计方式的彻底转型。双海子村包括2000年前后从牧业点上共搬迁过来四个村，一个村占一个方田。每个方田政府出资修建了两口灌溉机井，可完成整个方田的农业灌溉任务。在这一调查点上，媒介传播更加广泛；儿童集中就学、居民集中就医更加便利；加上因农业生产而与周边汉族农民的频繁接触，裕固族传统文化变迁表现在时时处处，显得鲜明和日益深刻。

### C 调查点——城镇点——肃南县城

今天，中国北方的县城街道上，依然存在公共广播的已经不多了。肃南县城的早晨是从街道上大喇叭播放的公共广播开始的。一般情况下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喇叭一响，县城就慢慢地活了起来。县城不大，但是规划布局整齐，结构紧凑，和中国所有的小县城一样，在某种角度看远离乡村和都市，而某种意义上又紧紧地联系着乡村和都市，乡土与时尚同时交汇和展现，又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充满大街小巷。县城主要的街道就三四条，但大兴土木的建筑工地很明显的表现出向周边扩展的趋势。全县三万多人，县城常住人口只有8000多人，路边还没有太高的建筑物，排列很整齐，在21世纪初，县上的一些领导出于多方考虑，想要突出自己的民族特色，通过协商，对县城内沿街楼房进行统一的“穿靴戴帽”，即在楼顶外沿装饰以藏式风格，修建琉璃瓦挑檐，楼体正、侧面装饰有突出民族特色、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的喷绘、壁画等各种图案，结果花了大力气完成的工程最终呈现出来的风格介乎于现代与民



族之间，显得有一些突兀。县城里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居民多是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的职工，还有一些商业经营人员。县城东边有一座民族公园，修建有亭子和长廊，但从整个园林体现的精神内涵上，并没有多少民族风格，倒是方便了周围群众，成为县城里老年人晨练的一个好空间。县城内开有博物馆、书店和网吧，县城西边正在修建新的影剧院。走在大街小巷中，可以感觉到这里是进入裕固族社会的外来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集中反映的地方，它的文化表现，正好是裕固族民族传统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转化的中间状态。